

何谓历史? 何谓中国?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系)

【摘要】 “历史”是在一定的时空里,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连续的过程。“中国”在1912年以前的三千余年里,或是多变的地理概念,或是模糊的文化概念,又或是复杂的民族概念;时至现代,以政治为标准,学者们认为“历史中国”的范围就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清朝版图。

【关键词】 历史;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中国;政治中国

【Abstracts】 History refers to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unity of certain space and time. In the course of 3,000 years prior to 1912, China represented, by definition, changeable sizes of territory, obscure culture phenomenon or complex relationship of ethnic groups. The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by the political standard, prefer confining geographically the History China to the territory of Qing Empire, exactly from its completion of political unity in 1750s to the western invasion in 1840s.

【Keywords】 History; Geography China; Culture China; Politics China

我们中学、大学的传统历史教学,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往往习惯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等的条块分割,如此,或者少有趣味、显得呆板,或者缺乏彼此的联系,把本为整体的历史人为地割裂开来。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曾经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由这样的形象比喻出发,我们不妨把中国历史想象成一场多幕大戏,我们是观众。那么,何谓中国?何谓历史?

先说“历史”。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给“历史”下的定义,大概已有几十种。按照我的理解,最浅显的说法,“历史”就是在一定的时间与一定的空间里,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连续的过程。这样,“历史”的三大支柱,就是时间、空间与人。历史的思维,如果以人为出发点,就是追寻六个“W”,即Who、When、Where、What、How、Why。换言之,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与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怎样做的,为什么。前五个W是“历史”,是对事实的描述;最后一个W是“历史学”,是对事实的解释。而顺着这样的思路问下去,就是一种直接、简单然而却有效的历史学思维。当然,历史学并不等于历史。历史是过去,历史学是对过去的无限求真,但求真永远不能等于真实。研究历史的,有时真想起古人于地下,或者走进时光隧道回到过去。然而,即便回到过去,就有真切的感受吗?也不一定。现代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我们就能说得清吗?所以历史学是一门充满遗憾的学问。历史学对历史的论述与对历史的理解,又总是受到论述者思维观念与理

解者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有人也认为,一切的历史学,都是思想史,或者都是现代史。这样,没有定论、总在创新的历史学,又是一门充满魅力的学问。

再来解释“中国”。我们时时接于目、闻于耳的“中国”一词,如果认真起来,其实非常不容易说清楚。东汉刘熙在《释名》的自序中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就“中国”这个名号言,也与此相仿佛。“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课堂上常常问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让人感叹的是,同学们往往哑口结舌或者语焉不详。这是滑稽的。所谓人有姓名,国有称谓;人不可不知姓名,国不可没有称谓。我们的祖先生长在中国,我们生长在中国,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生长在中国,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名号的来源含义,岂能不知,岂能不解!

问题在于,从夏、商、周直到元、明、清,传统时代并没有哪个王朝或者皇朝叫过“中国”;那么,我们习称的“中国历史”,究竟指的是什么地域范围、什么民族或人群的历史呢?比如前苏联政府有种说法:“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满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都不算是中国人。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地区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北部疆界在长城,西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和四川”;按照这种说法,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成了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开发的地区,《尼布楚议界条约》为对俄不平等条约,而《璦琿条约》与《北京条约》也就成了俄国收回部分失地的条约。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显然不可能接受。又清末,1907年,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国学大师章太

炎发表了《中华民国解》，文中说：“中国以西汉郡县为界，而其民谓之华民……故以中华民国之境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果然能够“任其去来”吗？又民国时代，鲁迅也曾经说过，元、清是中国历史上外族所统的大耻辱。我们知道，元的统治民族是蒙古族，清的统治民族是满洲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吗？再举个例子，旧时代的日本人不愿意称我们为“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傲慢而自大的名词，所以称中国为“支那”；虽然“支那”来源于China，但在中国人听来，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在中国人看来，更是绝对的不吉利，“支”是相对于“本”的，“支那”又有“支解那里”的意思，于是中国人反戈一击，把日本的Japan谐音为“假扮”。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国际纠纷与糊涂观念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十分罗嗦的概念。在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并以“中国”为正式简称之前，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模糊、多变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民族概念，作为国家代名词的政治概念的“中国”产生很晚，这便引发了“中国”的地域范围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

围绕“中国”概念的起源、演变，我曾经写过三本相关的书，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辽宁古籍出版社，与卢海鸣合作），2000年出版的《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国号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与宋艳梅合作）。由“寻源释意”到“伟哉斯名”，是由粗疏到精细；由“伟哉斯名”到“国号故事”，则是由学术到普及；至于专门的“中国”研究论文，我也发表了若干篇。为什么长期关注“中国”概念？因为这是事关国家、民族、国际关系大体的重要问题。

这里无意于展开对“中国”概念的详细讨论，但既然我们看的是“中国历史”这场大戏，则仍有必要就历史上的“中国”之特殊而多变的含义作高度概括的交代。

其一，“中”与“國”二字的解释。在殷商甲骨文与商、周金文中，“中”字的上下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右或向左飘，“本象有旒之旗”；商王有事，立“中”以招集士众，士众围绕在“中”的周围听命，所以又引伸出中间之中的意思。由中间之中，产生了中的引申义与诸多美义。因为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中作为地理用语，是相对于外、区别于偏的。延伸到文化上，中显得更为可贵，“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所以古人视中尤重。就为政而言，要“用其中于民”；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就处世而言，中为“天下之大本”。以此，文化上的中，为正为顺，为和平，为忠信，为合宜。

那么“國”字又作何解？在殷商甲骨文中没有國字，周金

文國字早期作或，“从口从戈以守一”，“口”（音韦）为国界，“戈”为武器，“一”为土地，“或”即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期孳乳为國，是加口以为國界，这属于文字上的自然演变。而中与國两字连在一起，就成为我国的古老名号之一“中國”了。

其二，“中国”名号的起源时间。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何尊，其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义民”；又我国最古老的文献《尚书》的《梓材》中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一句。虽然何尊为周成王时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梓材》虽然也是周成王时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名号已见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武王时期，当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中国”一词的出现，距今已经超过3000年了。

其三，先秦时期的“中国”概念。“中国”名号自从西周初期出现以来，迄于战国，大概800多年的时间里，或为地域概念，或为文化概念。

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所指地域随着对象与时代的不同，也不尽一致，大概来说，其前后积有六义：一指京师，即周天子所居的都城；二指国中，即诸侯国的国都；三指畿甸，即周的近畿以及列国的郊甸；四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五指诸夏国家，即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列国；六指中原诸国，即位置居中而文化又高的诸夏国家。其中，第五、第六两义，虽然发生的时间较晚，沿用的时间却较久，涵盖面则最大；在这两义的中国的背后，实际上显示着一种相对于四夷（蛮夷戎狄）的地理上与文化上的自豪感，表明了诸夏国家在民族、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种相互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经成为诸夏国家共同的国号，成为诸夏国家共同拥有的地域的专称。

与地域概念的“中国”指称的对象越变越多、指称的地域越变越大相联系，是先秦时期文化概念的“中国”是种美称，代表着一种文化标准。依照《战国策·赵策》的描述，“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云云，可知“中国”者，其人则聪明睿智，其财则万物所聚，其礼则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凡是诗书礼乐达不到这种标准或者风俗与之有殊者，就不得在中国之列。这样的中国，为远方所仰慕，为蛮夷所心仪。文化概念的中国，其标准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文化上达此标准者，即为中国；反之则为蛮夷。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于是蛮夷戎狄不断地中国化，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地增多。文化的“中

国”意义之伟大,正在于此!

其四,秦汉以还“中国”概念的流变。秦汉统一后,“中国”成为我国通用的名号,无论朝代怎样更迭,都一直使用。就其含义来说,则较之先秦时期,又有了发展。

首先,文化意义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中国象征着光明,为至高无上、雍容华贵之域,一切外邦都是蛮夷戎狄,照例是贫穷、落后、野蛮的地方;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化概念流变至此,其间弊端自不容讳,比如汉武帝、隋炀帝、明成祖、慈禧太后等等,总是喜于炫耀国力、粉饰盛世,就与这样的“中国”观念有关。而另一方面,文化的中国以其概念的宽泛,对于周边民族与国家又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奠定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比如清人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中,就记有这样的感人事例:“契丹主鸿基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非汉民族都不自外于中国,于是中国的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中国的地域也由灰小而广大!

其次,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秦汉以还,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所指仍然不一,或指京师,或指中原,或指内地,又或指全国(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还或指汉族建立的国家或皇朝法统。就皇朝法统言,历史上非汉族建立的国家也往往自称中国,尤其在分裂时期更是如此,有时还与同期存在的汉族国家争夺中国名号(如十六国时期的羯人石勒、氐人苻坚,自居“中国皇帝”,指东晋为“司马家儿”、“吴人”;南北朝时期,北朝政权以中国正朔自居,骂南朝为岛夷),至少也要平分秋色(如宋、辽、夏、金对峙时期,契丹的辽、女真的金是北朝,汉族的宋是南朝,党项的夏是西朝)。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又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今天如此,历史上本也如此。换言之,历史上无论地域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都不仅包括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原皇朝,也包括了汉族以外的民族建立的中原皇朝。

当然,中原皇朝的概念,也是模糊而多变的。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汉族和50多个非汉民族和衷共济;历史上的中国,就民族成员而论,也是如此。在这众多的民族中,汉族建立的皇朝习称中原皇朝;汉族建立的统一范围较大、统一程度较高的皇朝又习称中央皇朝。非汉民族建立的皇朝,如果汉化程度较高,或主要建立在传统的汉族地区,或所统治的主要是汉人,传统史学也称之为中原皇朝;而若统一范围和程度也较大较高,也被称为中央皇朝(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以此,前秦、北魏与东晋、南朝,虽都自称中国而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其实都是南北分立的中原皇朝;辽与北宋、金与南宋,也都是中原皇朝。至于秦、汉的匈奴,唐时的吐蕃、突厥,明时的鞑靼、瓦剌一

类,既不算中原皇朝,当然更谈不上是中央皇朝,他们只是各该时期的边疆民族建立的边区政权或国家,既不被该时期地域的中国所涵盖,也不包括在该时期文化的中国以内;然而,它们却属于现代更新了的政治概念的中国的一分子。

再次,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逐渐走向定型。政治概念即作为国家代名词使用的中国,如果一定要追溯其本源的话,似乎可从明朝后期算起。翻检《明史》,明朝廷对内对外的诏令、敕谕,多自称中国;九篇《明史·外国传》中,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与朝鲜、安南、日本等国并称。又明清时代,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直称中国,而不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使用逐渐普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中国的地域范围即指大清主权所达到的范围,但清朝的正式国号仍是“大清”。清朝在对外交往或正式条约中之所以乐于接受中国一词,那是一种传统心态在起作用,即沉醉于中国所代表的地域概念与文化意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先进文明的中心;也未尝不是对鸦片战争后国际关系中屈辱地位的一种心理补偿;大清对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使用的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所伴随的是割地赔款的耻辱!历史真是既冷酷又深刻。同样一个中国,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没有什么尊崇的意思;清朝却将之当成一种褒称,一种尊号,一种可悲的精神慰藉。及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才首次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简称,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最后,“中国”概念的现代更新。政治概念的中国含义,经过历久的讨论与争论,到了现代才有了更新。现代学者认为:所谓历史上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历代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朝(皇朝),当然更不应该与汉族或中原地区划等号。把中原王朝(皇朝)和历史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不符合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用什么范围来规定历史上的中国呢?以政治为标准,则历史上的中国,正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所指出的:“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具体来讲,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这一范围是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

之所以用清朝前期的历史疆域来确定“历史中国”的范围,当然也不仅仅是由于地域的中国的多变,文化的中国的模糊,或者任意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历史时期。近百年来,亚、非、拉地区许多原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在他们原有的即资本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历史疆域内恢复了独立。根据这样的国际惯例,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范围,理所当然地就是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疆域。

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统一多民族的具备完整主权的国家;它有着明确的疆域范围(比如早在1689年即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一疆域范围,又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1991年,谭其骧先生《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就此讨论道:“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完成统一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据此,谭先生得出结论:“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

总之,政治概念的中国,较之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它是中国概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中国涵义的升华,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

以上简单叙述了3000年来“中国”概念的变迁大概,这实在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大前提。譬如演戏,是大舞台还是小舞台,能够演出的戏剧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从时间上讲是场多幕戏,从空间上讲是台大戏,至于演员,则是众多民族与亿兆斯民,而所以能够演出这样的众多民族与亿兆斯民的

多幕大戏,离不开悠久的历史与广袤的空间。

推而言之,其实还不仅中国历史的研究,需要知道“历史中国”的概念;知道“历史中国”的概念,也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比如上面说到的文化概念的“中国”,因为“中”代表了正、顺、和平、忠信、合宜等等,这就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维与行为原则之一是“中庸”,即一切言行要不偏不倚,要无过无不及,所以中国人的心目中惟“中”为是。1927年,文化名人夏丏尊《误用的并存与折中》中说:“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与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它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住在北京。讨价一千,还价五百。再不成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这不但买卖上如此,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1927年,鲁迅《无声的中国》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这似乎可以称为“行为中国”吧,它使得中国人的行为,整体而言,不同于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冷静老成、德国人的准确高效严肃、美国人的自由开放幼稚、日本人的善采异邦与实用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是“中”,是中庸,是调和,是折中。而由此出发,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中庸,我们也可获得更深的理解。

注:此文节选自作者《看一台中国历史的大戏》书稿。

(作者信息: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210093。收稿日期:2012-05-06。)

编校:方玮

(上接第74页)书馆,“也应对社会开放、供民众阅览、查阅”。

参考文献

- 1、4、7 简耀东.中日韩三国图书馆法规选编[M].台北:文华图书馆管理,1994.406
- 2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
- 3 朱凡.台湾地区图书馆与大陆图书馆的比较与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2)
- 5 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 OA 检索[EB/OL].<http://adage.lib.nthu.edu.tw/OA/>

- 6 詹琰.虚拟空间中的“读图时代”——技术引发的美学变革[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5)

(作者信息:福建漳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福建农林大学2009级农业信息化在职硕士研究生。邮编:363000。收稿日期:2012-03-22。)

编校:方玮